目　录

我的大伯父袁克定……袁家宾（1）
我记忆中的父亲赵倜……赵得龙（36）

张学良在郑州……张一麟（65）
张学良亲挽敌将……习五一（67）
康有为中岳游雪……崔炎寿（69）
吴佩孚两次来登封……崔炎寿（73）
曹锟两次到中牟大仙庙扶乩
……李士杰口述　赵本固整理（75）
周恩来陪送杨虎城过郑州……张一麟（77）

先父王公转沙传略……王正中（78）
韩凤楼传略……郭海林（83）
我所知道的韩五峰……魏树人（87）
我与郑州……王光临（92）
清末荥阳举人侯化元……侯培池（96）
张骏卿为荥阳办的好事……李明中（101）

新八师戍守黄河……熊先煜（105）
花园口掘堤的情况补充……熊先煜（111）

韩复榘三事……贺粹之（113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对韩复榘的片断回忆……田晋生(115)
抗日时期的韩复榘……马宝岭(117)
津浦路北线抗战中的韩复榘……荆学礼(119)

在雅嘉达幸福地见到周恩来总理
和与宋庆龄副委员长合影的回忆……翁瑞兰(122)

密县银花……密县政协(125)
郑州黄河鲤鱼驰名中外……康普营　曹奔疾(128)

我的大伯父袁克定

袁家宾

我从15岁起，就与我大伯父袁克定相处，后来随他到北京居住，直到1958年他病逝，达27年之久未曾远离。下面所述我大伯父袁克定的情况，均系我的亲见亲闻，且属首版。

一、出生至成家梗概

我祖父袁世凯于1877年，随其堂叔袁保恒（清廷户部侍郎）由北京到河南开封帮助办理赈务。1878年因其堂叔突染时疫病逝，我祖父回家乡与我祖母于氏结婚。1879年12月生我大伯父，取名克定，字云台（后自取别号慧能居士）。大伯父生下来时，由于额上长着一块记，所以小名叫记光，也叫小记儿。这块记到他长大后就消失了，但祖父母直到他成婚后，仍然不时直呼他的乳名小记儿。

光绪八年（1882），因朝鲜发生内乱，清廷派山东庆军统领吴长庆率领全军入朝，我祖父也随军前往，先后在朝鲜12年。我大伯父是我祖父嫡出长子，从小就随祖父在朝鲜任上，由我大庶祖母沈氏抚养以至成立。他曾在德国留学，德文和英文都很好，书房里的书架上大多数是德文书籍。他从在朝鲜跟我祖父起，以后我祖父在济南任山东巡抚，在天津任直隶总督，在北京任军机大臣，一直随我祖父在任上，所以他对旧官场中的事情，非常熟悉通达，在政治上也很有野心。我祖父很喜欢他，也很信任他，经常让他做代表外出办事，直到他骑马摔伤，变成残废，对他才比较差了。但他毕

竟是祖父的长子，所以在家庭和亲友中以及在我祖父的一些部下面前，他所说的话，所做的事，还是被人重视的。

我大伯父的婚姻，是由我祖父作主包办的，娶的是湖南巡抚吴大澂的女儿吴本娴。我大伯母吴氏只生了我二堂姐家第。二堂姐后在天津嫁给苏州费祥仲教授（抗战前被国民党杀害）。由于大伯父属虎，大伯母属龙，认为龙虎相斗，会互相冲尅，按照迷信的说法，需找一个属鸡的女性来"牵一牵"才能破解。因此在祖父同意后，又娶了一个小户人家的姑娘马彩凤作为大伯的侧室，称大姨奶奶，我叫她大妈，她生我大堂兄家融，字容孙(因我祖父字容庵)。抗日战争前，家融在英商开滦矿务局任职员，日伪时期任伪实业部第二科科长，抗战胜利后，任天津市新懋交易行副经理，解放后任贵州省地质勘探工程师。我大堂兄娶北洋时期湖北督军王占元的三女儿王惠为妻。大堂嫂王惠生长子缉英（乳名佛保），现在香港；生长女智姑，随大堂兄在美国定居；次女能姑，三女巧姑均在香港。我大堂姐家锦也是我大妈马彩凤所生，在天津时嫁给通永镇总兵雷震春的长子雷存政为妻。

我大伯母吴氏耳朵很聋，大伯父和她说话只好笔谈，大妈马氏长的也不好看，均不能如大伯父的意，所以在我祖父就任总统时，我大伯父又纳一个唱戏的章真随（又名章淳一）为他的二姨奶奶。二姨奶奶是女文武须生，因擅演《定军山》，故时人多称她"老黄忠"。她举止轻浮，对我大伯父非常厉害。我大伯父很怕她，又很宠爱她，任其欺凌辱骂不以为怒。这个二姨奶奶偷吸鸦片成瘾，却不敢让我大伯父知道，因我大伯父从不吸烟、喝酒和赌博，也不准家人如

此，即使在分家后，我们家族亦不敢在他面前有上述表现，否则，将遭受他专制家长式的当面严厉斥责。二姨奶奶恃宠而骄，竟在津门家中与某西医大夫行为逾轨，其暧昧事被大伯父闻知，大发雷霆，断然割爱，将她驱逐遣送出津。他为了顾全面子和声誉，未公开声明与她脱离关系。1935年我大伯父全家由天津旧德租界威尔逊路（现河西区解放南路）85号，迁到北京北城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63号，但我大伯父却独居北京东皇城根14号住所。章真随也在北京，故不断写信给我大伯父，陈述生活无依，请求救济，我大伯父犹念旧情，照常按月供她生活费用达8年之久。这件事我大伯父是让原总统府的上差，后为他的贴身佣人戴文林私下办理的，不公开让我们家属和亲友知悉。我知道这件事，也是由戴文林亲口透露的。章在北京仍不检点，借与我大伯父过去的关系又进行招摇。我大伯父一怒之下，派专人将她送回河南辉县袁家花园中居住（此时袁氏在河南辉县等处田地房产均已被日伪当局明令归还），生活费用由我大伯父批签，在该处地租中支付。1938年以后，大伯父对她仍时有询问，未能忘怀。

长期以来，我大伯父对我大伯母吴氏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，我大伯母亦自觉的不去接近他；对我大妈马氏，因念其生有我长堂兄家融，母以子贵的旧观念，尚能一般和谐相安。

二、坠骑至残，赴德就医

我大伯父在成年时，一次在彰德车站，因骑马不慎坠地，腿被摔伤，后终日昏迷不醒，全家惊慌万状。当地巫医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借机向我祖母于氏进言：腿摔伤流血过多，元气大亏，必须服用人奶增加营养，方能早日恢复健康。我祖母听信巫医之言，没有及时请中、西医大夫治疗，便选择了一个乳母。这乳母是河南人，身强力壮，精血充足，其子名叫羊羔，故称她为羊羔娘，每日挤奶供我大伯父服用。后来腿伤虽自愈，但却留下跛足的后遗症。羊羔娘虽领到了重酬，后又来天津住在我大伯父家中，大伯父对其借此索要生厌，便最后一次性的赠与将其送回原籍。

我大伯父自腿摔伤后，走道时双脚高低不等，左右摇曳，略显瘸状，背后有人叫他为“袁大瘸子”，因此，多年来使用一精制竹质小手杖，竹杖的手柄与尾端均镶饰镂纹银头，很考究。

听大伯父说，他在我祖父任民国总统时，经德国友人穆默的劝说去德国治疗伤腿和休养。1911年通过德国驻华公使雷克斯的帮助，启程赴德医治腿疾。当时喧赫一时的北洋派人物如段芝贵（北京警察总监）、江朝宗（北京九门提督）等到车站送行，欢送仪仗和仪式均采用总统仪仗执事，近于对待国家元首的礼节，相当威严隆重。大伯父抵柏林后，即持我祖父袁世凯亲函，在谒见时面交德皇威廉二世，德皇亲自设宴款待于偏殿，密谈多时。我大伯父向德皇力陈中国非君主立宪不能图强，深得威廉同情与赞成。威廉把从前摄政王载沣来访时，对载沣所说的“强干弱枝的理论又向我大伯父重述一遍，他在德医治腿疾及休养，到1913年回国。当我祖父闻知德皇的态度时，欣喜若狂。对我大伯父更加倚重。我大伯父向我祖父提出了两项建议：一是迎接王士珍来京，代替段祺瑞主持军事；二是在总统府内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

率办事处，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，由总统亲自掌握。这两项建议，我祖父完全同意。

三、秘预我祖父的军机大事

我父亲袁克端（行四）曾和我提起过，我大伯父确实参预了我祖父的军机大事，密谋策划，例如，我祖父是乘辛亥革命之机东山再起的。1911年清王朝的"宣统皇帝"溥仪宣布退位时，我大伯父曾向我祖父献计，借机将过去与袁氏对立的清室诸王公大臣，均治罪处死，对溥仪左右亲信人员一律流放黑龙江，永不叙用，免贻后患。我祖父当时恐遭众议，没有采纳。在我祖父接到南京政府电请南下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，在对去不去南京，徬徨不定为难的情况下，1912年2月29日北京城内发生了第三镇兵变的事件。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祖父离开北京。实际上这次兵变的把戏，是我大伯父袁克定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。我祖父便以此作为不赴宁就职的借口，终于在南京政府的妥协下，在北京宣誓就职。

我大伯父在我祖父担任大总统以后，曾多次向我祖父建议，要图大业，必确保兵权，首先要培养训练军队中的核心骨干力量，把北洋派在全国的现役军职骨干人员，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训练，使之达到君臣师生一体化的程度，一切听从指挥。

当时段祺瑞任陆军总长。因其桀骜不驯，我祖父心存疑惧，欲除之而又不敢操之过急。恰巧我大伯父建议在我祖父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，成立一支模范军，由大元帅亲自兼任模范军军长，而后把模范军的官兵逐步分

配到北洋各军去，以加强对北洋各军的控制，既可削弱段祺瑞的军权，又不致军权旁落，以实现中央军事集权，达到袁氏子孙世代相承的家天下。这个建议我祖父虽然同意，但又觉得建立模范军的目标太大，恐引起反感，拟改军为师。于是1914年4月统率办事处主任蒋方震给我祖父呈上条陈说，以北洋军队暮气太重，思另行编练，作为模范，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之下，设立模范师筹备处。先练两师，中级军官用留学生，下级参用军官生及速成生，盖以变历来重用速成生摒除留学生之宗旨。我祖父后来又觉得模范师的目标仍然很大，最后决定先成立模范团，然后逐步发展为模范师或军。派王士珍为模范团筹备处长，直属于统率办事处。1914年10月23日，模范团正式成立，团部设在北海。我大伯父与我祖父密议，欲由他就任此团长，不但可直接削弱段祺瑞的军权，更可对段予以掣肘和制约的双重作用。这时段祺瑞对此事已有所闻，便面见我祖父，力阻其不可，说我大伯父形骸不全，有损军仪，难孚众望。我祖父与段早已貌合神离，彼此猜忌，此次更察觉段的本衷和来意，是训练北洋陆军非他莫属，实为自荐欲代之。我祖父便说道："云台确有不周之处，未堪委此重任，那么，我本人可以胜任吗？"段听后默然而退。我祖父即以陆海军大元帅兼模范团长一职。并在北京西城旃檀寺设立模范团办事处，由我大伯父在此主持建军诸项事宜。后来我祖父忙于筹备帝制和外交，模范团从第二期开始，便改由我大伯父任团长了。为此，段祺瑞随即辞去陆军总长，赴西山养病。我大伯父乘其来向我祖父禀报之机，诱使他第十、十一、十二诸幼弟及其子家融等在中南海居仁堂附近，向段群起而哄骂："穷秀才！"、"段歪

鼻子”，进行羞辱，以泻其愤。段对此气愤已极，即向我祖父面述。祖父只微笑不语，段只好退出。第二期结业不久，我祖父即病逝，模范团随之停办。

我大伯父自从帝制发生后，就以皇嗣子自居，经常向我祖父献计进言。他说不能在开国之前留下子孙后代的藩镇之祸。当时他是我祖父唯一可信的人，言听计从，以前的废省政道，废督裁兵，轮流召见各省军阀以及在北洋军以外、另设拱卫军的种种计划，都是他的主意。

1915年春，当日本向中国提出“21条”交涉时，我大伯父公开向人们说：“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时，老头子（我祖父）问过段总长可否武力抵抗，段总长回答得很干脆：如果发生战事，三天内可以亡国。”接着我大伯父又感叹地说：“陆军如此无用，总长所司何事？这就是政府不得不接受日本条件的全部原因。”我大伯父把我祖父与日订立卖国条约21条的责任，轻轻地推到了段祺瑞的身上。

四、为谋皇储，造舆论，动杀机。

我大伯父在我祖父就任大总统以后，政治上顿萌野心。他多年来随我祖父拜倒在皇权之下，极端羡慕帝王的淫威和特权。我祖父既有称帝阴谋，他更有立为皇储的欲望，迫不及待地竭尽全力鼓动我祖父早日黄袍加身，亲登大宝。

1985年我见到当年祖父总统府机要秘书朱宝仁（一字铁林，河南项城人，已89岁），把他写的当年我大伯父，借国际上对中国实行帝制的态度而制造舆论的原文，让我抄录下来留存。朱老先生说，1912年，英、日两国驻华公使朱尔典、日之益，曾给我祖父密电说：“英国、日本两国政府愿与中

国联盟，但英日两国均为君主制，而中国尚系民主，联盟恐不能长期巩固。联盟后愿帮助中国建立强有力之政府（暗指君主）。"

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，在东京报纸上发表谈话说："有日本为君主国体，中国若行帝制，则与日本为同一国体，日本当然乐为赞助，且袁氏（指我祖父）事实上已总揽中国之统治权，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。"

1913年美国古德诺博士由美来华，途经日本时，向新闻界发表《对中国之意见》的谈话。来北京谒见我祖父后，我祖父把他在北京所著的《共和与君主论》一书，让英文翻译、参事林步随翻译后，畅行当时。书中倡言中国宜于君主立宪，指出民主政体不及君主。后来我大伯父在我祖父的《洪宪筹安会宣言》上大肆吹嘘"美国大政治学者"古德诺博士的"卓越远见"，并同时夸张地宣传英日两国政府和日本首相如何公开支持等等。

我大伯父的外籍密友，英人朱尔典、日人有贺长雄（日本陆军部大本营中佐参谋，我祖父小站练兵时的军事参谋兼总教官）、西原（日本驻华外交官、在我祖父与日本签订21条卖国条约时，曾为其向日政府借款，后为我祖父的顾问）亦在侧向我大伯父反复陈述变更国体是长治久安的大业。后来在北京与当时的外交总长曹汝霖闲话时，他亲口告诉我，朱尔典在中南海怀仁堂国宴间，竟用英语尊称我祖父为"陛下"；西原在给我祖父的信中，竟有"请贵大总统高陛"等辞句。

我祖父本有迷信思想，他既相信八字，也相信风水之说。有人给我祖父批过八字，说他的命"贵不可言"。后来

在天津听我家老佣人陶树德说，我大伯父为迎合我祖父，1914年底，指使原籍项城祖坟看守人韩诚，将旧石块刻写“天命攸归”等字样，，加以人为的古化，深埋地下，待其腐蚀多日，取出后送到北京展示，作为朕兆，并让韩诚谎称在我曾祖父袁保中坟侧，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，形同火炬，照耀方园里许。又捏造说，袁氏先茔附近生长一株紫藤树，状似盘龙，长逾丈许。这些谎言征兆和国际上的舆论，无疑对我祖父“洪宪称帝”是有很大影响的。从1914年开始酝酿帝制，到1915年下半年，北京中南海内外，完全被称帝的气氛笼罩着，我祖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我大伯父的活动，也由秘密转变为公开。我祖父的机要秘书夏午贻（字寿田）每日周旋于我祖父和我大伯父之间，传递信息，往返通报。

1915年1月间，我大伯父曾邀请梁启超到北京西郊汤山就宴，目的是挟制他服从帝制。当时只有洪宪筹安会的主亨，所谓著名的“六君子”之一的杨度（字晳子）一人坐陪。我大伯父对梁的谈话，阴阳含蓄，表面上力排共和，无一是处，实际上暗示他袁氏要变更国体，来试探他所持的立场和态度。因当时双方的见解不同，谈话始终格格不入，席未终即不欢而散。不久我大伯父再次约梁面谈。此次，我大伯父开门见山，直言变更国体，问梁肯否协作，并以恫吓言辞要挟。梁当时被迫无奈，说容和大家商议后再行回复。次日梁启超回复说大家无异议时，我大伯父顿时喜形于色。

1933年与我祖父的机要秘书夏午贻谈及往事时，他说我大伯父当时俨然以皇世子自居，已提前刻就“大皇子印”金印一颗，相当精致，一些邀宠者，在上呈我大伯父书函时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也称之为“大皇太子殿下”。但此金印并未动用过，后来帝制失败回津门，此印如何处理便不得而知了。

1915年，我祖父日夜紧张忙碌称帝时，内外交攻的形势向他逼来，蔡锷首先在云南发动了起义，组成了反袁护国军，紧接着日本也改变了原来赞成帝制的态度。这些本已够我祖父烦心了，家庭内关于立太子，而惹起的纷争使他更加恼火。我大伯父因骑马把一条腿摔坏了，左手也受了伤，手心没有厚皮，经常戴着一只手套，因此，我祖父说他“六根不全”将来怎能够“君临万民”。因此，他曾露出口风，要在二伯父克文和五叔父克权二人中，择一立为太子。由于新华宫传出“立贤不立长”的风声，造成了人所共知的我祖父已亲自密谕选定完毕，等我祖父不在日，即公开付诸实施。听我父亲克端和我七叔克桓说，我二伯父和五叔父的金花皇子服与其他诸兄弟的不同，与我大伯父的皇子服从形状、款式、色彩、镶缀、刺绣等各方面完全一样，毫无差别，1915年秋，除我大伯父外，他们兄弟曾在中南海新华宫前合照一像，二伯父，五叔父的衣服确与其他人不同。我父亲曾向我大伯父质问皇子服不一样的原因。我大伯父只说，“可能是老二和老五背着大爷(大伯父称呼我祖父为”大爷“)用重金买通瑞蚨祥(北京最大的绸缎店。洪宪大典，我祖父登基时穿的龙袍和祭天祭孔时穿的大礼服，宫中男女礼服及文武百官的礼服，统由大典筹备处负责人袁乃宽让该店包办制做的)掌柜的偷做的。老四你不要着急，等我到时候，再收拾他们。”他虽这么说内心却惶恐终日，寝食不安。他有时在中南海乐字廊居住，但大多住北海团城。原在1914年7月，我大伯父曾以养病为由，住在北京西郊汤山，由拱卫军三个分队随从护卫，此时这支拱卫

军改驻团城，担任他的护卫军。

此时，我大伯父左右幕僚，有急欲作进身之阶者，便以唐朝李世民宫门喋血的故事暗示他。不久，我大伯父在其住所团城设西餐午宴款待其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诸兄弟。我二伯父身侧亦不乏智友谋士，闻讯后也以曹丕、曹植兄弟"煮豆燃豆箕"之事相告。在午宴上，我大伯父劝酒时，二伯父借故滴酒未饮，用随身自带的银制刀匙试用，果然发现银匙变成黑色。我二伯父当即含怒离席，诸兄弟亦随之不欢而散。此事被我祖父知道后，密召我大伯父大为斥责。我祖母于氏却一再偏袒我大伯父，与我祖父争吵不休，使他多日郁郁不乐，但终无良策以缓解此矛盾。

使我祖父更加恼火的，是发现我大伯父搞的假版《顺天时报》。《顺天时报》，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、日本人办的汉文报纸，我祖父平日公余，专门看它。大概由于是日本人办的报纸，才使他受了假版的欺骗而毫不自知。还是我三姑母袁叔祯后改名静雪字子蕴，在无意中发现家里人看的《顺天时报》与外面买东西作包装纸的《顺天时报》日期相同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，我大伯父使我们全家人和外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。这个情况我三姑母告诉了我祖父。我祖父把我大伯父找来，问明是他搞的鬼，气愤已极，就在我大伯父跪地求饶中，用皮鞭子把他打了一顿，一边打，一边还骂他"欺父误国"，从此我祖父对我大伯父不再信任了。

五、帝制失败，扶柩返籍葬父

1916年元宵节后，我祖父就感到精神不振，食量大减，

恹恹成病。据当时给我祖父看病的中医肖龙友老先生说："袁总统的病，平时患有膀胱结石症，只是小便困难，但决不会有生命危险，每日服我的中药，仍可照常下楼办公和会客。"我祖父"洪宪称帝"遭到国人的普遍反对，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，精神上的压力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，虽经中医治疗，心病是药力难奏效的。我祖父看到大势已去，乃明令撤销帝制，但仍想保全总统职位，而这时已四面楚歌，众叛亲离，连他最信任的四川都督陈宧（是我大伯父的把兄弟），湖南都督汤芗铭也先后通电独立，其打击尤为沉重，使他羞愤交加，又恨又怕，就再也支撑不住了。在这里说一下陈宧。1915年2月20日，我祖父命他会办四川军务，并在北洋军中抽调冯玉祥三个混成旅，随他入川。陈宧在启程前，晋见我祖父，请示入川机宜。我祖父对陈说："以后我可能叫云台到成都去，你去和云台谈一下。你们之间要以兄弟相待，也许将来我叫你负更大的责任。"陈当即去乐字廊看我大伯父，我大伯父对其轻蔑不以为礼，陈勉作寒暄，即欲退出。这时我祖父的上差符殿卿，突然急遽挥汗跑来回道："总统传下话来，请大爷和陈大人换帖拜把子。"我大伯听言，立即改容叫陈宧二哥，并亲切地请陈坐下畅谈。当陈问及我大伯父的其他兄弟时，我大伯父眉头一皱，鄙夷地说："他们都不是成材的料子！"陈宧到四川接事不久，即派大批员工赶修皇城，并常亲去监督。其幕僚问他为何经营这种不急之务，他说："我是替大爷（我大伯父）当差的，如果他将来封为蜀王，不能没有雄伟的王府。"幕僚们又问："太子要留在北京城，如何会外封藩王？"陈说："我看老头子（我祖父）有立爱不立长之意，可能要把储位留给

老五（克权）。”

旧历四月中旬以后，我祖父的病势加重，不再下楼办公，但仍在卧室坐床看公文，有时还会见一些重要的来客。到五月初病势更重，不能下床，也不再办公，不过四五天时间就不行了。他的膀胱结石，如果住院开刀也不致危及生命，但他一向不信任西医，到后来不能吃，不能尿，病情发展到尿毒症时，中医已束手无策，我大伯父才坚决主张改西医诊治，请法国医生贝熙业来府进行了导尿术，以解除痛苦。后来听我大伯父说，五月初三的黄昏，我祖父可能感到自己的病势严重，才叫我大伯父把徐世昌和段祺瑞两人找来，並让取出总统印，亲手交给徐世昌说：“总统应该是宋卿（黎元洪的字）的了。我就是好了，也准备回彰德啦。”据当时在现场的符殿卿(我祖父的总管兼近侍)后来在天津告诉我，五月初四中午，我祖父突然接到他亲自派去的援湘副司令唐天喜（我祖父的随身侍从，自幼即跟我祖父，参加过朝鲜中日战争，蔡锷云南起义后，派他为援湘副司令）的“叛变”的消息，立即精神失常，口中反复说：“唐天喜反了！唐天喜反了！……”从此以后，我祖父渐渐昏迷不醒。五月初五，我大伯父见我祖父病已不起，请法国医生贝熙业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，神志略转清醒。他自知死期将至，命我大伯父把徐世昌、段祺瑞、王士珍、张镇芳等四人请来，做他的顾命大臣。当徐世昌最后赶到时，我祖父望了他一眼说：“菊人来得正好，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。”徐安慰我祖父说：“总统不必心急，静养几天自然会好的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总统有话，早点安排出来也好。”当时，我祖父嘴唇蠕微颤动了一下，吐出“约法”两个字来。徐、段二人正要

动问，守在病榻前的我大伯父，急忙代我祖父回答说："金匮石屋"。此时我祖父已气如游丝，噤不能言，把头微微动了一下，似乎表示同意。我大伯父又叫法国医生贝熙业给我祖父打了一针强心针，我祖父由昏迷中又苏醒过来，十分吃力地吐出最后四个字："他害了我！"这个"他"指的是谁，始终没人弄清，据袁氏长辈人猜测，可能是指的我大伯父袁克定。五月初六（阳历6月6日）我祖父与世长辞了，终年58岁。当日北洋政府发表了公报："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10时40分，以尿毒病薨逝，停柩居仁堂，遗令以副总统继任。"

我大伯父在我祖父灵前，麻衣麻冠守灵祭丧，以头触棺纵声大哭："爸爸！爸爸！我对不起您！"哀毁逾常。我祖父入殓时，穿的是祭天礼服（上面绣的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），下围有褶紫缎裙，头戴平天冠，上面有日、月、星一类的装饰品，还有一串所谓的"旒"，脚登朱履。我大伯父扶灵柩归葬彰德。在下葬期间，我大伯父虽然腿脚不便，在别人的搀扶下，坚持了十几天的三跪九叩大礼，并孝守亡父庐墓，直到6月28日才奉我祖母于氏来天津寓居。我祖母单独一人另居天津河北区六集里一宅，我大伯父同其妻妾等，住在旧德租界威尔逊路（现解放南路）85号，并任天津英商开滦煤矿名义督办，在家坐领甚丰的月薪。

后来在津，听我大伯父的挚友董晓岚说，在我祖父发丧时，曾用了皇帝仪仗。他对我说："大爷（指我大伯父）总算对得起总统在天之灵了。大爷在帝制尚未登基时，早就把清室的一些皇帝仪仗取来备用，在洪宪皇帝登基那几天，用了一两次后，就陈列在怀仁堂内，帝制取消后诸事纷纭，未

得送还清室。总统逝世，灵柩恰巧就停放在中南海怀仁堂内，所以在总统出殡发丧时，大爷就随之将这些仪仗完全摆入了丧仪行列中去了。总统有知，亦当含笑九泉了。"

六、主持两次分家

我大伯父安葬毕我祖父，回到天津后，袁氏全家提议分家，我大伯父也同意，特邀请我祖父生前莫逆老友、民国副总统徐世昌，出面主持第一次分家。关于分家详情，说法不一，据我三姑母在《我的父亲袁世凯》一文中说，我大伯父，因系嫡出长子，独分40万，其余庶出的儿子，每人各分12万元。他们所分的钱数，除了现金以外，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（包括开滦煤矿、启新洋灰公司、自来水公司等股票）在内。她还约略记得，大伯父兄弟每人还分得有十条金子。姑母们每人只给嫁妆费8千元。我祖母和各庶祖母都不另分钱，各随她们所生的儿子一同过活。她还说，我祖父生前所置的房产，向来是由袁乃宽负责管理的。据他说房产的情况是：在北京计有城内锡拉胡同两所，炒豆胡同一所，郊区海淀挂甲屯一所；在天津有英租界小白楼"矿务局"一个大楼（我祖父东山再起时，我们由彰德搬到天津所住的地方），还有地纬路一所（我二伯父后来在天津所住过的地方）。这些房产是我大伯父兄弟们后来才分的，怎么分法她也不清楚。她说袁乃宽说的房产情况，大家认为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，但管房人这么说，我祖父又没留下遗嘱，也只得罢休。可是我父亲说，这次分家，因我祖母于氏系原配嫡夫人，故分得遗产较多。我大伯父除了他个人的多年的积蓄和在彰德老家中的全部财产，这次所分还占有全家公产总和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